

蘇軾選集

(修訂本)

王水照 選注

王水照蘇軾研究四種

中華書局



蘇軾選集

(修訂本)

王水照 選注

王水照蘇軾研究四種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蘇軾選集:修訂本/王水照選注. —北京:中華書局,2015.5
(王水照蘇軾研究四種)
ISBN 978-7-101-10678-7

I.蘇… II.王… III.中國文學-古典文學-作品綜合集-北宋 IV.I214.41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010155 號

-
- 書 名 蘇軾選集(修訂本)
選 注 者 王水照
叢 書 名 王水照蘇軾研究四種
責任編輯 彭 偉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
版 次 201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規 格 開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張 13 $\frac{1}{8}$ 插頁 2 字數 400 千字
- 印 數 1-3000 冊
國際書號 ISBN 978-7-101-10678-7
定 價 56.00 元
-



王水照，浙江餘姚人，1934年7月生。196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後入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今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1978年春，調入復旦大學中文系任教，1998年任復旦大學首席教授。現任復旦大學文科特聘資深教授，中文系學術委員會主任、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宋代文學學會會長、《文學遺產》顧問、《新宋學》主編等職。著述丰厚，所撰著作獲省部級、國家級優秀成果獎多項，是當代宋代文學研究的奠基者與拓荒者之一，2012年獲上海市學術貢獻獎。

主要著述一覽表：

- 《蘇軾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2月版
- 《唐宋文學論集》，齊魯書社，1984年7月版
- 《蘇軾えの人と文學》，日本東京日中出版社，1986年6月版
- 《宋人所撰三蘇年譜彙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1月版
- 《蘇軾論稿》，臺灣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4年12月版
- 《宋代文學通論》，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6月版
- 《王水照自選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5月版
- 《蘇軾傳》(合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版
- 《中國文豪蘇東坡》，韓國漢城月印出版社，2001年4月版
- 《歷代文話》，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10月版
- 《宋刊孤本三蘇溫公山谷集六種》，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年10月版

總 序

我與蘇軾研究結緣，起因於那特殊年代的幾次特殊機遇。1958年暑假，北京大學中文系1955級同學響應當年“大躍進”的號召，決定自己動手編寫一部文學史，挾持“學術大批判”的狂飆，聲言要把“紅旗”插上中國文學史的領域。其時課堂教學中，還剛剛學完唐代文學，我却被編入宋元文學寫作組，開始接觸蘇軾作品。在那個對古人粗暴批判、對老師批判粗暴的風潮中，寫成的兩卷本“紅皮”文學史却獲得巨大的聲譽，同學們頗有自豪感。然而次年政策調整，糾正“大批判”中的過“左”傾向，於是我們又作全面修改，出版了四卷本的“黃皮”文學史，向正常的學術書寫稍作回歸。1960年，我大學畢業後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又參加另一部《中國文學史》的編寫，再次承擔了蘇軾一章的寫作。三次修“史”標誌着我蘇軾研究的起步，甚至也可以說是問學之途的發軔。

然而，這一“起步”却充滿惶惑、遺憾乃至悔恨，其教訓比經驗更多、更深刻，給我以長遠的影響。特別是“紅皮”文學史的寫作，使我們處於既熱情亢奮又思想僵化、馴化的矛盾交集之中，隨着時間的推移，也逐漸體會到堅守主體意識的重要。蘇軾那首《水龍吟·次韻章質夫楊花詞》中的“楊花”，被作者的生花妙筆，賦予了活生生的生命。她漫天飛舞，姿態變幻，自以為充滿活力和情思，殊不知全是受外力之“風”驅遣的結果。我讀楊花詞就每每有種身

不由己的悲哀。由此提醒自己：為時裹挾，望風落筆是學人的大忌，初步認識到獨立思考、保持自我是學術創新的根本。當然，這一“起步”也並非都是負面的。尤其是參加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那段編寫文學史經歷，應該說受到了頗為嚴格的學術訓練和學術規範、良好學風的自律教育。開始懂得文獻資料是一切研究工作的基礎和前提，而作家的創作文本更是研究某位作家最重要、最核心的材料。正是閱讀了蘇軾的全部詩詞作品、大部分文章及其他背景材料，才對蘇軾有了一點自己的看法，並養成了強烈的讀蘇興趣，為今後的研究奠定了基礎，引導我繼續走向“蘇海”。

對歷史人物進行個案研究，通常採用專題論析、作品解讀、人物傳記、作家年譜等著述體裁，以期從多種角度、不同層面來展示歷史人物的真實全貌。這是一種有效的、便於操作的方法。朱東潤先生研究宋代梅堯臣、陸游，分別貢獻了三部著作，即《梅堯臣傳》、《梅堯臣集編年校注》、《梅堯臣詩選》和《陸游傳》、《陸游研究》、《陸游選集》，並能彼此互闡，相得益彰，在方法論上有示範意義。這裏匯集我的有關蘇軾著述四種，即《蘇軾研究》、《蘇軾選集》、《蘇軾傳稿》、《宋人所撰三蘇年譜彙刊》，也不外乎上述的著述體裁範圍，編成叢書，似略示系統性。其實，這原不是預先有意的策劃和設計，而是自然形成的。或出於出版社的約稿，或受新資料發現的啟發與推動。現將四種著述情況向讀者作個簡單的交代。

《蘇軾研究》是一部論文集，除作為“代序”的《走近“蘇海”》外，共收文二十三篇，分作“綜論篇”、“思想篇”、“品評篇”、“影響篇”、“譜學篇”五個專題，而對研究對象蘇軾而言，則經歷了從政治家蘇軾到文學家蘇軾再到作為士大夫精英型範蘇軾的演化過程，這與我國國內蘇軾研究的動向幾乎同步，也可說是與時俱進吧。學術工作者不論秉持何種立場和主張，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時代的影響，但“與時俱進”與“為時裹挾”是有本質區別的。區別即在於能否堅

持自我意識與獨立思考。這些論文都寫作於1978年“新時期”以後，表達的是個人認真研究後的一些心得，錯誤則自然難免，期待讀者教正。

《蘇軾選集》原是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國古典文學名家選集”叢書之一，是對蘇軾創作文本的解讀。這套叢書給予選註者以較大的編寫自由，允許在一般選本的字句訓釋、典故介紹等之外，自行設計欄目，我就按需要添置“評箋”、“附錄”等類（這套叢書中後出的選本多循此例），似能擴大文獻面，增強學術性，成為一般讀者和蘇學專家都可參閱的讀本。但仍存在不少缺失，此次重印，儘量作了彌補與修訂。

《蘇軾傳稿》原是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國古典文學基本知識叢書”之一，屬於普及性讀物。全書篇幅不大，以蘇軾一生的文學道路為敘述的中心線索，重點較為突出。我曾與兩位門人分別合作過《蘇軾傳：智者在苦難中的超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初版，2008年再版）和《蘇軾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兩部傳記，前者展示蘇軾豐富多彩、跌宕起伏的人生，努力於學術性與大眾閱讀的結合；後者對蘇軾的文化創造和歷史功績進行全面論析和深入闡釋，較富學術內蘊。此兩部傳記主要是合作者的勞績，不宜收入本叢刊，讀者如有興趣，當可參閱。本書有日文、韓文兩種譯本，曾引起日、韓兩國報刊的關注。2013年9月，韓文版修訂重印，據韓譯者的統計，共有十六家韓國媒體作過報導，實出乎我的意料。“蘇子文章海外聞”（高麗朝權適詩）、“文章傳世帶方州”（蘇頌詩，漢江古名帶水），說明蘇軾的文學魅力幾百年來至今不衰。

《宋人所撰三蘇年譜彙刊》的編輯，乃是緣於我在日本講學期間發現兩種稀見的宋人所撰蘇譜，即何掄《眉陽三蘇先生年譜》、施宿《東坡先生年譜》。這兩部書不僅編撰時間早，而且保留不少珍

貴的蘇軾背景資料。因與其他三種宋人所撰者合刊一集，以見今存全部宋人蘇譜，當有裨於蘇軾研究。何、施兩種年譜國內久佚，重新引進中土，為國內學術界所矚目，“讀蘇者為之驚喜不已”（孔凡禮先生《蘇軾年譜自序》）。

以上四種拙著以叢書形式再版，算是我個人治蘇道路的小結。事實上，“蘇海”的博大，遠非這幾種著述形式可以涵蓋，倘若天假以年，我仍有興趣在此領域繼續耕耘。

王水照

2014年10月

前 言

北宋三位舉足輕重的大作家歐陽修、王安石和蘇軾都活了六十六歲，這真是歷史的巧合。就蘇軾現存集子來看，他最早的成名文章是嘉祐二年(1057)應試時所作的《刑賞忠厚之至論》，時年二十二歲；最早一批詩作是嘉祐四年(1059)再次赴京途中父子三人合編《南行集》裏四十多首作品(查慎行、馮應榴、王文誥均謂蘇詩最早之作爲嘉祐四年(1059)出蜀前的《咏怪石》、《送宋君用游輦下》兩詩，但有人疑是僞作)，時年二十四歲；最早的詞寫于熙寧五年(1072)，時任杭州通判，年三十七歲。其創作起始時間并不比歐、王早，但也度過了長達四十多年的創作生涯，爲我們留下了二千七百多首詩、三百多首詞和四千八百多篇的各類文章，其數量之巨爲北宋著名作家之冠，其質量之優則爲北宋文學最高成就的傑出代表。

時間跨度如此漫長、作品內容如此豐富的創作歷程，必然呈現出階段性。探討和研究蘇軾的創作分期，必將有助於對其作品思想和藝術特點的深入理解。最早提出這個問題的就是他的弟弟蘇轍。在《東坡先生墓誌銘》中，他說蘇軾“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爲空言”；“既而讀《莊子》”，有深得其心之嘆；“謫居於黃，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而轍瞠然不能及矣”；又說“公詩本似李杜，晚喜陶淵明”。這裏對“初好”、“既而”的時間斷限雖不明確，但認爲黃州、嶺海爲其創作變化時期則是清楚的。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〇云：“余觀東坡自南遷以後詩，全類子美夔州以後詩，正所謂‘老而嚴’者也”，進一步申述嶺海為詩風“老而嚴”時期。陳師道云：“蘇詩始學劉禹錫，故多怨刺，學不可不慎也；晚學太白，至其得意則似之矣，然失於粗。”（《後山詩話》）蘇軾的好友參寥補充說：蘇軾“少也實嗜夢得詩，故造詞遣言，峻峙淵濬，時有夢得波峭。然無已此論施於黃州以前可也。……無已近來（指建中靖國時）得（蘇軾）渡嶺越海篇章，行吟坐咏，不絕舌吻。常云：‘此老深入少陵堂奧，他人何可及！’其心悅誠服如此，則豈復守昔日之論乎？”（《曲洧舊聞》卷九）也認為黃州、嶺海為兩個創作階段。清人王文誥在《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識餘》中，把蘇軾一生創作分為八期：《南行集》和簽判鳳翔、熙寧還朝、倅杭守密、入徐湖、謫黃、元祐召還、謫惠、渡海；他還指出謫黃、謫惠為兩大變，渡海後則“全入化境，其意愈隱，不可窮也”。前人的這些評論，值得重視。

蘇軾的作品是他生活和思想的形象反映，他的創作道路不能不制約於生活道路的發展變化。他一生歷經了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個朝代，這是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逐漸形成、社會危機急劇發展的時代，也是統治階級內部政局反復多變、黨爭此起彼伏的時代。蘇軾卷入了這場黨爭，他的一生也就走着坎坷不平的道路。除了嘉祐、治平間初入仕途時期外，他兩次在朝任職（熙寧初、元祐初）、兩次在外地做官（熙寧、元豐在杭、密、徐、湖；元祐、紹聖在杭、穎、揚、定）、兩次被貶（黃州、惠儋），就其主要經歷而言，正好經歷兩次“在朝—外任—貶居”的過程（關於蘇軾生平事迹，參看拙編《宋人所撰三蘇年譜彙刊》）。

蘇軾這種大起大落、幾起幾落的生活遭遇，造成他複雜矛盾而又經常變動的思想面貌和藝術面貌，給研究創作分期帶來不少困難。但是，第一，他的儒釋道雜糅的人生思想是貫串其一生各個時

期的；筆力縱橫、揮灑自如又是體現於各時期詩、詞、文的統一藝術風格。這是統一性。第二，他的思想和藝術又不能不隨着生活的巨大變化而變化。我們認為，與其按自然年序，把他的創作劃分為早、中、晚三期，不如按其生活經歷分成初入仕途及兩次“在朝—外任一貶居”而分為七段，並進而按其思想和藝術的特點分成任職和貶居兩期：思想上有儒家與佛老思想因素消長變化的不同，藝術上有豪健清雄和清曠簡遠、自然平淡之別。這是特殊性，也是分期的根據。

嘉祐、治平間的初入仕途時期，是蘇軾創作的發軔期。他懷着“奮厲有當世志”（《東坡先生墓誌銘》）的宏大抱負走上政治舞臺，力圖幹一番經世濟時的事業。他唱道：“丈夫重出處，不退要當前”（《和子由苦寒見寄》），“屈原古壯士，就死意甚烈。……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節”（《屈原塔》），一副捨身報國、邁往進取、風節凜然的儒者面目。反映在詩文創作中，是《郡塢》、《饋歲》、《和子由蠶市》等一批富有社會內容的詩歌和《進策》二十五篇、《思治論》等充滿政治革新精神的政論文。蘇軾是位早有創作準備的作家，這時的詩文雖然不免帶有一般早期作品幼稚粗率和刻意鍛鍊的痕跡，但藝術上已日趨成熟。論辯滔滔、汪洋恣肆的文風，才情奔放、曲折盡意的詩風，都已烙下個人的鮮明印記。如古體詩《鳳翔八觀》，王士禎認為“古今奇作，與杜子美、韓退之鼎峙”，“此早歲之作”可與黃州後所作匹敵。（《池北偶談》卷十一“岐梁唱和集”條）《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與子由別於鄭州西門之外……》，汪師韓嘆為“詩格老成如是”（《蘇詩選評箋釋》卷一）。而《和子由澠池懷舊》等近體詩，紀昀評為“意境恣逸，則東坡本色”（紀批《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其豪健清雄更足以代表他以後整個任職時期的獨特風格。

兩次在朝任職時期是蘇軾創作的歉收期。熙寧時與王安石變法派矛盾，元祐時又與司馬光、程頤等論爭，激烈動蕩的統治階級

內部鬥爭佔據了他的注意中心。今存熙寧初二三年間所作詩歌不足二十首，為蘇詩編年的最低數字（前在鳳翔任職的三年內，寫詩共一百三十多首）；元祐初所作固然不少（二百首左右），但除題畫詩外，名篇佳作寥寥無幾；且題材較狹，以應酬詩為主，雖不能一筆抹煞，但畢竟視線未能注視到更重要的生活領域。這時的詩歌風格，仍然在多樣化之中保持健筆勁毫的統一傾向。他的至親好友文同曾追憶熙寧初他天天去汴京西城訪晤蘇軾：“雖然對坐兩寂寞，亦有大笑時相轟。顧子（蘇軾）心力苦未老，猶弄故態如狂生。書窗畫壁恣掀倒，脫帽襯帶隨縱橫。誼諷歌詩咄文字，蕩突不管鄰人驚”（《往年寄子平〔即子瞻〕》），宛然是李白再世。其時為數甚少的詩作也多少留下這種狂放不羈的投影，或記人物：“吾州之豪任公子，少年盛壯日千里”（《送任佖通判黃州兼寄其兄孜》）；或抒感慨：“君不見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誇舌在牙齒牢，是中惟可飲醇酒。讀書不用多，作詩不須工，海邊無事日日醉，夢魂不到蓬萊宮”（《送劉放倅海陵》）；或寫書法藝事：“興來一揮百紙盡，駿馬倏忽踏九州。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石蒼舒醉墨堂》）至於元祐初在京所作的一批題畫詩，如《虢國夫人夜游圖》、《趙令晏崔白大圖幅徑三丈》、《次韻子由書李伯時所藏韓幹馬》、《郭熙畫秋山平遠》、《書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等，蒼蒼莽莽，一氣旋轉，令人想見其濡墨揮毫時酣暢淋漓、左右逢源的快感。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五云：“子瞻雖體格創變，而筆力縱橫，天真爛熳。集中如虢國夜游、江天疊嶂、周昉美人、郭熙山水、定惠海棠等篇，往往俊逸豪麗，自是宋歌行第一手。”除詠周昉美人圖的《續麗人行》作於徐州，《定惠海棠》作於黃州外，其他三篇皆作於此時。而《定惠海棠》淡雅高絕，已屬貶居時期的風格，實不宜以“俊逸豪麗”目之。

熙寧、元豐和元祐、紹聖的兩次外任時期是蘇軾創作的發展期。不僅創作數量比在朝時增多，名篇佳作亦美不勝收。先後兩

次外任都是蘇軾自己請求的，他企圖遠離統治階級內部鬥爭的漩渦，一則避開是非，保全自己，二則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以踐初衷。因此，其時儘管由於抑鬱失意不時流露出超曠消沉的情緒，但積極入世精神仍是主導。加之實際生活擴大了他的政治視野和社會閱歷，他的總數不多的社會政治詩大都產生於此時。其中有抨擊時政的《吳中田婦嘆》及其他涉及新法流弊的詩篇，有他杭州賑濟疏湖、密州收養“棄子”、徐州抗洪開礦、潁州紓民飢寒的藝術記錄，有《於潛女》、《新城道中》、《無錫道中賦水車》、《石炭》等各地風土人物的形象描繪。這都說明蘇軾具有反映重大題材的思想基礎和藝術才能，只是由於生活巨變等原因未能繼續得到新的開拓，在貶謫時期的創作注意力主要轉到個人抒慨，題材趨向日常生活化。政治社會性較強是蘇軾整個外任時期（包括初入仕途時期）詩歌的共同思想特點。

其次，以這時期為主的整個任職時期，蘇軾詩歌的主要風格在豪健清雄方面，於前代詩人，對李杜韓劉（禹錫）汲取較多。他的不少七古七絕，如《東陽水樂亭》、《歐陽少師令賦所蓄石屏》、《書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真》等頗具李白超邁豪橫之氣，前引《送劉攽倅海陵》的起句直逼李白《行路難》，其《送張嘉州》“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謫仙此語誰解道，請君見月時登樓”，更是句用李詩《峨嵋山月歌》，格從李詩“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金陵城西樓月下吟》）化出，而此詩首句“少年不願萬戶侯，亦不願識韓荊州”，則反用李白《與韓荊州朝宗書》。他的《荊州十首》之於杜甫《秦州雜詩》，《真興寺閣》之於《同諸公登慈恩寺塔》、《訪張山人得山中字二首》之於《尋張氏隱居二首》以及《次韻張安道讀杜詩》、《壽星院寒碧軒》等詩，前人常有“句句似杜”、“前六句杜意，後二句是本色”（紀昀語）之類的評論。他的《石鼓歌》，其奇橫排鼻，潑墨淋漓堪與韓愈《石鼓歌》比肩，《司竹監燒葦園，因召都巡檢柴貽崑

左藏以其徒會獵園下》亦與韓《汴泗交流贈張僕射》、《雉帶箭》等圍獵之作一脈相承。至於由杜韓肇端的議論化、散文化傾向對於蘇詩結構、選字、用韻以至宏偉風格的形成，更發生了直接的重大影響。趙翼《甌北詩話》卷五云：“以文爲詩，自昌黎始；至東坡益大放厥詞，別開生面，成一代之大觀。”所言甚確。至於劉禹錫，陳師道謂蘇軾學其“怨刺”，則有《鄙鳩》、《雨中游天竺靈感觀音院》及指斥新法流弊諸作可爲佐證，參寥謂蘇學其“峻峙淵澗”、“波峭”，蘇轍也推重劉詩“用意深遠，有曲折處”（《呂氏童蒙詩訓》），這在蘇詩中也不乏其例。從上述師承關係中不難從一個方面看出蘇軾其時的審美傾向。前人又多謂蘇詩“傷率、傷慢、傷放、傷露”，“獷氣太重”（紀昀語），“一瀉千里，不甚鍛鍊”（趙翼語），正是放筆快意，追求豪健清雄風格所帶來的缺點。

第三，這時期蘇軾開始了詞的創作。雖然比之於詩，起時較晚，但一開始即以有別於傳統婉約詞的面貌登上詞壇。通判杭州初試詞筆，他就打破了“詩莊詞媚”（王又華《古今詞論》引李東琪語）的舊框框，運用詩的意境、題材、筆法、語言入詞，初步顯示出“以詩爲詞”的傾向。記游的《行香子》（一葉舟輕）寫浙江桐廬七里瀨“重重似畫，曲曲如屏”的景色，觀潮的《瑞鷓鴣》（碧山影裏小紅旗）寫錢塘弄潮兒搏擊江潮的習俗，抒寫鄉情的《卜算子》（蜀客到江南），感慨身世的《南歌子》（冉冉中秋過），都有一種清新流暢、疏宕俊邁的詩的情調。尤如贈別杭州知州陳襄的一組詞作，如《行香子·丹陽寄述古》、《虞美人·有美堂贈述古》、《訴衷情·送述古、迓元素》、《清平樂·送述古赴南都》、《南鄉子·送述古》等，語言明淨，意境深遠，與設色濃豔、抒情纖細的傳統送別詞各異其趣。在自杭赴密途中，他作《沁園春·赴密州，早行，馬上寄子由》云：“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少年。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閒處看？身長健，但

優游卒歲，且鬪尊前”，勃勃英氣，力透紙背，洋溢着待時而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和自豪。沿着這一創作傾向繼續發展，終於在密州時期寫下了《江城子·密州出獵》和《水調歌頭·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這兩首最早的豪放詞代表作，從而在詞壇上樹起“自是一家”的旗幟。徐州所寫《浣溪沙》五首農村詞則以濃鬱的泥土芳香和淳朴真摯的思想感情，表示了詞在題材、意境上的進一步開拓。這時期詞作的這一傾向與他以儒家積極進取精神為主導的思想傾向是一致的，也與詩風的主要傾向相類。

第四，包括這時期在內的整個任職時期，散文寫作着重在議論文（政論、史論）和記敘文兩類。前者如奏議、策論、進論是爲了向朝廷直接表達政見，後者如亭臺樓堂記是爲了立碑上石，大都帶有應用文性質，并非嚴格意義上的文學創作，但仍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尤如鳳翔所作《喜雨亭記》、《凌虛臺記》、密州所作《超然臺記》、徐州所作《放鶴亭記》等，都是傳誦一時的名篇。雜記《日喻》、《石鐘山記》等則不僅以形象生動感人，而且以警策哲理給人有益啓迪。

以上是蘇軾前後三十多年任職時期的主要思想面貌和藝術面貌。

元豐黃州和紹聖、元符嶺海的兩次長達十多年的謫居時期，是蘇軾創作的變化期、豐收期。

震驚朝野的“烏臺詩案”是蘇軾生活史的轉折點。他開始了四年多的黃州謫居生活。沉重的政治打擊使他對社會、對人生的態度，以及反映在創作上的思想、感情和風格，都有明顯的變化。

蘇軾人生思想的特點是“雜”：既表現爲儒佛道思想因素同時貫串他的一生，又表現爲這三種思想因素經常互相自我否定。如《韓非論》對“虛無淡泊”的老莊哲學斥爲“猖狂浮游之說”，指出他們把“君臣父子”關係視作“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那麼，“父不足

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以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在《議學校貢舉狀》中，指責“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爲聖人”的風氣，認爲莊子“齊死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的一套，是“人主”用以“礪世磨鈍”的“名器爵祿”的銷蝕劑。這是從儒家治世的角度批判佛老。而在《和文與可洋川園池三十首·二樂榭》中又謂：“仁智更煩訶妄見，坐令魯叟作瞿曇。”“二樂榭”命名來源于孔子“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論語·雍也》）之說，文同提出質疑：“二見因妄生，仁智何常用”，蘇軾和詩亦意謂佛理高于儒學。儒家入世，佛家超世，道家避世，三者原有矛盾，蘇軾却以“外儒內道”的形式將其統一起來。宋代釋智圓云：“儒者飾身之教，故謂之外典也；釋者修心之教，故謂之內典也。”“故吾修身以儒，治心以釋。”（《閑居編·中庸子傳上》）蘇軾有詩云：“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署名王十朋的《集注分類東坡詩》卷二引師（尹）曰：“白居易晚年自稱香山居士，言以儒教飾其身，佛教治其心，道教養其壽。”一僧一俗，所言全同。在宋代三教合一日益成爲思想界一般潮流的情勢下，蘇軾對此染濡甚深，并具體化爲以下形式：任職時期，以儒家思想爲主；貶居時期，以佛老思想爲主。兩件思想武器，隨着生活遭遇的不同而交替使用。這又是與儒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孟子·盡心》）的旨趣相通的。

蘇軾在《初到黃州》詩中寫道：“自笑平生爲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逐客不妨員外置，詩人例作水曹郎。只慚無補絲毫事，尚費官家壓酒囊。”在自我解嘲中，仍想有“補”國“事”，對貶逐則淡然處之。但是，政治處境險惡如故，生活困頓與日俱增，一種天涯淪落的悲苦孤寂之感油然而生。最初寓居定惠院時所作的《卜算子》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栖”的孤鴻，《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